

「四一五」清黨前廣州國民黨左派的反共轉向 ——以《現代青年》為中心的研究*

彭毅聰**

國民黨容共時期，黨內分化出堅持聯俄容共政策的左派。左派與中共緊密合作，將革命推向高潮。在此過程中，前者對後者日漸產生防備與競爭的心態。兩派關係之惡化，發生在國民黨中央遷漢前後的廣州。1926年底《廣州民國日報》出版的《現代青年》副刊，被視為左派的中心言論機關之一，受到廣州左派青年歡迎。該刊與《嚮導》、《人民週刊》、《少年先鋒》進行辯論，也刊登一些左派青年對共產派的批評。《現代青年》上的言論，反映廣州清黨前幾個月間，左派對自身的革命信仰、階級屬性、革命性，以及國共關係的思考，指向的是兩黨誰領導中國革命及誰終將勝利的問題。廣州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與右派趨同，預示其最終走向與右派聯合反共的道路。

關鍵詞：國民黨左派、國共關係、左派青年、國民革命

*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及華南師範大學宋德華教授對本文提出的意見。

** 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

通訊地址：廣州市中山大學南校區永芳堂(歷史系)郵編：510260。

通訊信箱：pengkof@zoho.com

一、引言

1926年12月27日，《廣州民國日報》出版一份名為《現代青年》的新副刊。在《發刊的話》中，該刊一開始自稱是為引導青年走上正確的道路——信仰孫文主義而創設，而它接下來的內容就明顯有向中國共產黨「叫板」的味道：

「朋友，應該確信」，我們總理所指示的國民革命，才是一條最正確的路途，最有神效的藥方，馬克思列寧，固有其相當的價值，但是現在在中國的環境，我們總理決不是一個「騎瞎馬的盲人」，決不是一個必殺人的庸醫，而是一個「能觀察環境的高明的革命領導者」，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不是病理學家，「朋友，你應該確信」罷，是真能領導中國革命的，除了國民黨之外，實在沒有辦法的，「朋友，你應該確信罷！」¹

這篇發刊詞多次重複使用「朋友，你應該確信」的表達，很可能是回應中國共青團粵區委員會機關刊物《少年先鋒》的一篇文章《你應該確信——獻給新戰士》中的以下內容：

朋友，你應該確信，只有馬克思與列寧所指示的世界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才是一條最正確的路途，是有神效的藥方！朋友，你應該確信，只有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的中國CP與CY是真正能領導中國革命，使他走上正確的道路，並且使他一日千里，完成中國革命，完成中國在世界革命中所負擔的使命！²

這兩篇立場針鋒相對的文章，顯示出兩種革命指導思想的對壘，其背後亦即國共兩黨對革命領導權的爭奪。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國民黨左派要人甘

¹ 鳴鑾，〈發刊的話〉，《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現代青年》為《廣州民國日報》副刊。

² 青柏，〈你應該確信——獻給新戰士〉，收入廣東省檔案館等編，《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8）第4輯，頁310。所謂CP指共產黨，CY指共青團。

乃光掌控下的《廣州民國日報》，³其副刊是反映左派立場，因此這兩篇文章所反映的就是國民黨左派與中共的交鋒。

在《現代青年》出版約 20 天前，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突被張靜江下令解散。在驅逐其中親共的黨部骨幹後，組織特別委員會暫管市黨部。這個臨時機構的負責人被甘乃光、李濟琛等分別來自國民黨左右兩派之人物平分，中共黨員卻無一席位。⁴以上兩件事均體現當時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關係背後的暗湧。

關於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之國民黨左派或國共關係的研究，國內外已有不少成果。左派研究主要包括個別高層人物研究，以汪精衛為核心的研究，及國民革命結束後改組派或汪派的研究。國共關係史研究主要聚焦兩黨中央層面的互動，對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關係出現逆轉的經過也有詳細記載，但是對 1926 年末國民黨中央北遷後廣東的國共關係關注不多；廣東地方史、工農運動史更多留意北伐後廣東政治的右傾及中共方面的抗爭，卻未詳細探究兩黨關係逆轉的背後原因。⁵

³ 整理黨務案後中央宣傳部長由顧孟余擔任，但至 1926 年末甘乃光已控制《廣州民國日報》。甘氏兼省黨部宣傳部長，掌控另一日報《國民新聞》。見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北京：線裝書局，2014）第 5 冊，頁 108；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北京：線裝書局，2014）第 6 冊，頁 446-447。

⁴ 事緣陳琪瑗、簡琴石（前者身兼市黨部宣傳、青年、工人部長及常委，後者為商民部長，均親共）欲強行接管組織部，被張靜江派兵阻止並解散黨部。其指定的特委會成員：常委李濟琛，宣傳部長甘乃光，工人部長陳孚木，組織部長徐天深，青年部長曾養甫，婦女部長廖冰筠，商民部長黃旭升。

⁵ 參見李志毓，〈話語、路線與鬥爭中的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問題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9）；山田辰雄，《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80）；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卷 7；曾慶榴，《廣州國民政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梁尚賢，《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霍新賓，《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係變動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等。

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關係逆轉之端倪

有學者指出，國民黨容共之後出現的所謂左右派，主要是共產黨的一種話語，聯共者為左派，反共者為右派，誰左誰右其實不斷在變。⁶隨著兩黨關係最終破裂，所有左派人物在中共眼中皆右傾。當時廣州國民黨左派(下文簡稱左派)中較著名者，有廖仲愷、汪精衛、何香凝、鄧演達。後起的甘乃光、陳公博、顧孟余則被稱為左派三傑。⁷儘管左派堅持聯俄容共，但他們對中共的態度並非徹底友好。張國燾認為，在左傾氣氛極濃的國民黨二大上，「大多數代表對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懼之心。開明的國民黨代表，往往也要說幾句話，表明其純粹國民黨員的立場」。⁸據陳公博回憶，在三二〇事件之前，⁹國民黨人不論左右派，「無不想限制共產黨的活動」。可見兩者關係早就不是一帆風順。

從三二〇事件到整理黨務案的頒佈，反應國共關係明顯倒退。整理黨務案能夠順利通過，不純粹源於三二〇事件的餘威尚存及共產派的主動退讓，也源於左派對該案有相當的贊同。正如鮑羅庭觀察到：左派「確實害怕國民黨終將被共產黨吃掉」，故認為該事件也符合他們的意願。¹⁰該案通過後約半年時間裡，儘管廣東黨政兩界高層的人事任命之中，包括共產派在內的左傾人物仍占相當比例，但廣東國共衝突卻暗流湧動。8月間左派要人之一的顧孟余與到粵考察的維經斯基作過一番長談，抱怨中共在各級國民黨黨部勢力過大，將國民黨布爾什維克化。他主張共產派在所有組織中的力量應減少到目前的三分之一。¹¹在這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回顧半年來的局勢指出，三

⁶ 李志毓，〈話語、路線與鬥爭中的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問題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9)，頁32-33。

⁷ 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下冊，頁1329。

⁸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第2冊，頁84。

⁹ 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艦事件，指1926年3月20日蔣中正以中山艦陰謀暴動為由，一度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蘇俄顧問辦事處，扣押廣州共產黨人的事件。

¹⁰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28。

¹¹ 〈維經斯基與顧孟余談話記錄〉，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上冊，頁423。

二〇以後「國民黨領袖對於工農運動的態度變壞了。就是所謂左派的領袖也是如此」，「無論大小事件，只要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就以為這是民眾故意與他們為難，換言之，即是 CP 故意與他們為難。」¹²且認為左派懷疑 CP，害怕 CP，防閑(即防備)CP。此時國民黨正在廣州召開中央與各省黨部聯席會議，在這個「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的會議中，通過了一系列左傾色彩濃厚的決議，但左派在會議期間的秘密活動，正悄然改變著廣東的政治風向。據中共廣東區委報告：

在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中，新進的甘乃光很努力作組織左派的工作，很努力使他們影響的左派青年到群眾中間活動。甘並且給左派一個理論主張：以農民為國民黨的階級基礎，國民〔黨〕的工作應該從下層做起。聽說他的那本小冊子已經銷售了五萬本了，並且在省黨部宣傳部每天早晨八點鐘以前，召集他所領導的一般左派青年，開會討論他的理論。他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名義，創辦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造就一班青年，準備派到廣東各縣主持農工運動。¹³

根據這個報告，可知左派正在加強自身的組織與理論基礎。對共產黨來說，加強左派力量本來是他們所樂見的，但據陳延年 1927 年初的報告：聯席會議期間，左派私下抱怨中共「欺騙」他們，把左派當作中共與右派之間的緩衝器，令左右派互鬥。還指責中共「操縱了各種事情……左派沒有權」。¹⁴這些不滿產生的後果是左派意圖「開展一個拯救黨的運動」，即提出理論，加強自身組織。曾被中共視為「最好的左派」的甘乃光在此發揮了重要作用。¹⁵甘氏在聯席會議後開始建立左派組織，以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為領袖作政綱(在共產黨看來即

¹² 〈粵區來信〉，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2冊，頁637。

¹³ 〈粵區來信〉，頁638。

¹⁴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廣州：廣東省供銷學校印刷廠，1982)乙2，頁3、9、14。緩衝器的說法確有依據，見〈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574。

¹⁵ 〈粵區報告(二)〉，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654。

所謂有理論)。他很注意在群眾中宣傳，並贏得不少知識份子的擁護。¹⁶這些擁護甘乃光的黨員，有不少加入他建立的小組織——左派青年團(簡稱LY，顯然是對應共產派之CY)。參加者除有相對年輕的知識分子外，另有陳孚木、徐天深兩重要左派人物加入。¹⁷據LY成員回憶，該組織的參加者不多，非常鬆散，每週聚會一兩次是其主要活動。¹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並非為培養農工運動的領導，而是為訓練從事制裁、調解的官員，與中共領導之以階級鬥爭為目標的激烈工農運動，在理念上完全不同，由此亦可看出左派與共產派爭奪民眾的意圖。在共產派看來，國民黨是沒有群眾的。中共中央甚至指示廣東區委，設法讓國民黨左派領袖能夠擁有左派群眾作基礎。左派深感「CP有群眾而他沒有群眾……自己太沒有根據，沒有力量，沒有群眾，一切群眾都被CP拿去了」。¹⁹從共產派手上爭取民眾，一方面可鞏固左派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可爭取實力派的支持。

聯席會議期間左派秘密完成的另一項工作是與李濟琛實現合作。據說李濟琛與左派合作的原因之一，是期待「革命群眾的幫助」。²⁰據瞿秋白報告，李濟琛曾表現得非常左傾，常恭維《嚮導》雜誌。²¹陳延年也指出，李濟琛在10月聯席會議期間「非常友好」。²²李氏的「左傾」表現，源於其反對蔣中正(含蔣在穗代表張靜江)的立場。會議期間「他與左派站在一起」且非常活躍，

¹⁶ 〈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576-577；〈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頁2。

¹⁷ 張漢儒，〈大革命時期廣州的青年政治團體略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第5輯，頁108。據張氏言，陳徐二人在LY成立後才加入。徐天深原為陳策部團長，1925年參加二次東征時擔任軍隊政治工作，後掌管惠州八屬黨務，1926年8月任海軍處黨代表，乃廣州左派快速冒起之新星。

¹⁸ 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下冊，頁1332-1333。甘乃光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時，陳克文為該部秘書。另有人回憶指LY成立大會有數百人參加，見李燦生，〈何香凝老人軼事〉，《大人》，第41期(香港，1973.09)，頁2。

¹⁹ 〈粵閩雜記〉，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廣州：廣東省供銷學校印刷廠，1982)甲6，頁362。

²⁰ 李濟琛稱農會分子為土匪，自然很難得到共產派的支持。

²¹ 〈秋白由粵回來報告〉，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6，頁348。

²²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頁8。

但基於實力不足卻從未公開表示反蔣。²³李氏與左派合作的成果是「犧牲他最好的政治朋友古應芬」。²⁴左派與中共早欲借改組廣東省政府除去古應芬，惟古氏原有李濟琛作依靠而未果。²⁵古氏被「犧牲」後，即辭去民政廳長職務。聯席會議後廣東省政府重組，李氏擔任軍事廳長，多名左派人物擔任各廳長或委員，古應芬卻沒獲得任何席位。²⁶但去除古氏不意味著左派與共產派的關係更融洽。

聯席會議期間，顧孟余也聯同一些北方與會代表進行秘密的小組織活動。其密商內容涉及將來國共分家，汪蔣合作問題。顧氏認為「分家不是最近的事……但國民黨要早作思想準備」。²⁷他同樣積極聯絡廣州青年黨員，其支持者為廣東高師畢業生組織的左進青年社(簡稱 KY)。²⁸不過現存史料對 LY 以外的其他左派組織與人物鮮有詳細記錄。²⁹

此時廣州左派與共產派之摩擦，在後者對前者的不屑態度中也有所體現。除嘲笑前者無群眾外，中共粵區委還將甘乃光、顧孟余等左派領袖稱為「一班士大夫」，不是真左派而只能算「準左派」，是懶惰、軟弱、偏狹、嫉

²³ 李濟琛為源於粵軍的第四軍軍長，粵系軍人多帶排斥駐粵外省軍政勢力之色彩。此時第四軍或出省北伐，或駐防廣府以外區域，衛戍廣州的卻是蔣中正第一軍的錢大鈞部，故李濟琛在省城並無實力。

²⁴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頁8。

²⁵ 〈省政府改組與古湘芹塌台〉，《總匯新報》(新加坡)，1926年10月8日，5版；〈中共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議的意見〉，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320。

²⁶ 省政府委員有陳樹人(民政廳)、李濟琛(軍事廳)、孫科(建設廳)、陳孚木(農工廳)、甘乃光，何香凝，許崇清(教育廳)、周佩箴(土地廳)，宋子文(財政廳)、李祿超(實業廳)、徐權伯(司法廳)。10月初古應芬辭職後帶領其親信李仙根、謝瀛洲等人離粵勞軍。

²⁷ 參加密商者包括丁惟汾、郭春濤、童冠賢等。見范予遂，〈我所知道的顧孟余〉，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卷20，頁474。

²⁸ 張漢儒，〈大革命時期廣州的青年政治團體略述〉，頁106。

²⁹ 據〈沃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26年底甘乃光、陳孚木、王夢一在廣州成立了囊括幾十名廣州著名左派人物在內的「左派同盟」。不知該同盟是否指LY或其它團體，王夢一又是誰的譯名。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卷7，頁69-70。

妒的右傾分子或戴季陶派，甚至用「這樣的東西」來稱呼其組織，認為他們只有在聯合對抗右派時才有存在必要。³⁰

三、早期《現代青年》與國民黨左派青年

國民黨聯席會議結束後，在粵中共高層注意到左派試圖在各地擁有「代表刊物」，以便對其黨員作思想、言論、行動的指導。³¹上述 LY 青年中，余鳴鑾、李燏生、范譔成為替左派宣傳的幹將。³²1926年12月，由甘乃光氏兼任部長的廣東省黨部宣傳部，掌握了《廣州民國日報》與《國民新聞》兩份日報。³³早在10月1日，《國民週刊》創刊，從名字能看出它與《國民新聞》有關。上述余、李、范三人均《國民新聞》主筆，他們同時也在《國民週刊》作文。³⁴該週刊發行通訊處，即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因此 LY 成員很可能兼有《國民週刊》、《國民新聞》編輯、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教師或學生的身份。據李燏生晚年時聲稱，《國民週刊》與隨後面世的《現代青年》都是專與共產派刊物唱對台的。考慮到後者是當時廣東最重要之官方報紙的副刊，隨報紙廣泛傳播(據說連重慶也有喜愛的讀者)，³⁵其影響力應比前者更大。

《現代青年》首任主編余鳴鑾(筆名鳴鑾)，為廣州長大之臺山籍人。約1922年從廣東高師畢業後，與陳克文、畢磊等同學創辦廣州知用學社與知用中學。余氏曾追隨甘乃光在國民黨廣東省宣傳部工作。甘氏任省農民部長時，他和

³⁰ 〈粵區來信〉，頁638；〈中共廣東粵區對於左派問題之討論〉，收入中央檔案館等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頁405-408。

³¹ 〈國民黨中央地方聯席會議經過情形〉，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663-664。該年8月甘乃光曾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分別有著名的機關刊物，國民黨左派也需要有「中樞言論機關」，見甘乃光，《中國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廣州：國民新聞報社，1926)，頁7-8。

³² 李燏生，〈何香凝老人軼事〉，《大人》，第41期(香港，1973.09)，頁2。

³³ 當時中央宣傳部北遷，將《廣州民國日報》改歸省黨部；《國民新聞》本為國民黨人胡毅生所辦，因廖案被接管，後歸省宣傳部。廣州清黨前的《國民新聞》多未見存於世。

³⁴ 中央檔案館等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19-1949廣東報刊資料選輯)》(廣州，1992)下冊，頁65-66。甘乃光，《中國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頁4。

³⁵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6日。

陳克文、范諤都是該部幹事。³⁶1927年2月18日開始，該刊主編改為李燄生（筆名燄生或焰生）。³⁷他曾以「李牧」為筆名在《國民新聞》寫社論，1926年12月7日開始，又為《廣州民國日報》寫社論。李氏自述曾在南路發動工運，因當地共產黨員雷慧貞「唆弄」，被陳濟棠逮捕並下獄。³⁸可知他到廣州工作前已跟中共發生衝突。主編該刊期間，他還兼任過省黨部宣傳部代理秘書。³⁹廣州清黨後，由姚寶猷自4月21日起接任主編，至6月8日再交回余鳴鑾負責。廣州二次清黨後，左派在粵無法立足，但《現代青年》仍持續出版到1934年3月16日第869期才結束。

至少在廣州二次清黨之前，《現代青年》面向之受眾應該是支持國民黨左派的一般知識青年。被捲入大革命狂潮的這些青年，無論加入中共或國民黨，大多數僅接受過中小學教育，有學者稱之為「半知識份子」。不少投身革命的青年，無法被現有的社會結構吸納，只能徘徊於各大城市。在成長過程中，他們時常感受到求學、生存、戀愛的三大煩惱。⁴⁰從《現代青年》接受的大量社會投稿中，多少可看到一般左派青年的生存狀況。⁴¹他們有的具備討論主義的文化水準，有的則因文筆不佳而令主編大為頭疼，偶爾還有人提問「左派是怎樣的」。⁴²不少人在刊中吐露自己的三大煩惱：有人感慨自己家

³⁶ 張瑞權，〈知用學社和知用中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第10輯，頁130；該書編輯組，《彭湃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180；梁尚賢，《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頁451。

³⁷ 李氏原名李松影，又名李培松，1897年出生，廣東防城（今屬廣西）人，欽州中學畢業。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壇小有名氣，曾主編《新壘》文藝月刊，擔任《粵華報》主筆等，1949年逃香港。見李燄生，〈同情的失掉〉，《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8日；《報壇「霹靂火」李燄生》，最後訪問日期：2021年10月28日，<http://lowaiming88.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html>。

³⁸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2日。《現代青年》第24至28期連載邱祥霞（防城籍共產黨員）的〈受傷的小鳥〉，是以李氏為原型創作。又見朱光編，《崇敬與思念》（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頁52。

³⁹ 〈編者的話〉，《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5日；〈通信〉，《現代青年》1927年3月26日；燄生，〈總答覆〉，《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9日。

⁴⁰ 李志毓，〈話語、路線與鬥爭中的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問題為中心〉，頁108、111-116。

⁴¹ 不過部分文章也是編輯化名投稿，具體占比不明。

⁴² 〈問答〉，《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日。

庭貧困，「不適宜於貴族的大學」，即便畢業亦不過是個大書呆，無法推倒高築的債台。⁴³有人自粵北山區辭去教員隻身來穗，住在滿是臭蟲、飯菜難以入口的旅館。接受完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的培訓後，依然為找不到工作而恐慌。⁴⁴李燄生則自歎「愛的國度裡，我是沒有國籍的」，「從來未有得到快樂之神半刻鐘的撫慰」。⁴⁵他們常把自己的不幸歸咎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封建社會、土豪劣紳等等，文章常寫勉勵自己或別人參加革命的口號。一些作者愛以純粹的，始終信仰孫文主義的國民黨員自居。⁴⁶為推翻自己不幸的來源，他們以從事國民革命為奮鬥目標，有人甚至聲稱要完成世界革命，可見其意識形態受共產黨影響很大。⁴⁷對於共產黨，《現代青年》中的左派作者亦稱之為革命的同盟軍，稱讚其工作努力。有的人對中共的嚴格紀律與嚴密組織充滿矛盾感情，一方面承認這些是革命黨所需的，另一方面又不滿其「機械冷酷」。⁴⁸1926年末至1927年初，《現代青年》儼然成為廣州左派青年的聚集地。有人在文中自稱「左派青年」、「左派努力者」；有人去信讚揚甘乃光主張建立左派中心言論機關有「遠見」；有人讚揚李燄生令「我們左派青年真活潑起來了」，「左派青年的主張已極表示出來了！」⁴⁹

儘管《現代青年》面世時間明顯晚於各類共產係刊物，但其影響力已受到共產派注意，並被視為左派青年的喉舌。當時廣州革命青年長期購閱的左翼刊物是《嚮導》、《中國青年》、《人民週刊》、《少年先鋒》，其思想受這些刊物影響頗大。儘管思想左傾的青年頗多，但不代表青年們一定同意上述刊物的言論。《現代青年》面世後，一些左派青年開始在裡面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該刊初時偶有長篇連載論文，後來改以一千字上下的論文為主，偶有小說、詩歌。李燄生主編後，增加了青年講述自身經歷的文章，還增辟與讀者互動的欄目。各論文的具體內容，有的純為口號式地呼籲青年參加革

⁴³ 月白，〈一封家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9日。

⁴⁴ K.N.，〈我一年來的回顧〉，《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0日；K.N.，〈我一年來的回顧(三)〉，《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5日。

⁴⁵ 邱祥霞，〈受傷的小鳥(四)〉，《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8日。

⁴⁶ 周應湘，〈覆CY的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14日。

⁴⁷ 〈問答〉，《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日。

⁴⁸ 李燄生，〈熱情的應酬〉，《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31日。

⁴⁹ 格孚，〈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命，有的則含有對共產派的不滿，甚至帶論戰性質。1927年《少年先鋒》第2卷19期刊登《致現代青年記者》一文，否認共青團或共產黨隊伍中有叫「何畏」者。因這個何畏兩次去信責罵《現代青年》及李敏生，李氏在批駁何畏時把他叫做「幼稚的」、「你們CY」，故共青團方面有此澄清。⁵⁰該期《少年先鋒》還以CY名義發表給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公開信：「最近二三個月來，我們常常聽見你們當中有人責難我們……『幼稚的CY』，『CY的幼稚分子』，這是你們常說的。」可見共產派已將其視為代表左派輿論的刊物。下文即以該刊早期(創刊至清黨為止)涉及國共關係的討論來分析國民革命後期兩黨關係的變化。

四、關於中國革命應選擇的道路與主義之討論

1927年2月，中共廣東區委代表陳延年在漢口報告，廣州左派開始宣傳共產主義不適合當時的中國。⁵¹《現代青年》創刊號的發刊詞，即針鋒相對地駁斥《你應該確信》中對共產主義的鼓吹，並呼籲青年「確信」三民主義和國民黨。該刊後來又陸續刊發多篇含「應該確信」或「不應該確信」這類句子的論文。例如龍鼎的《你們應該怎樣確信》，錫慶的《你不應該確信》，惜馨的《青年戰士的戰略》，黃健生的《你不要懷疑》，孔昭鑿的《讀野火〈給本黨右派青年一封信〉以後》。⁵²以上文章或是要求讀者「確信」走國民革命的道路，或是模仿《你應該確信》的寫作方法去表述觀點，顯示各作者對《你應該確信》反應之強烈。

《現代青年》創刊號還有篇古有成所作的論文寫道：「中國資產階級及大地主，力量很小，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勢力，所以工農兩大階級對於他們的反抗和仇視，並不強烈到像俄國的工農對他們本國的貴族，和大地主一般。」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小、不集中，農民又保守，「事實上中國還沒有人在

⁵⁰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2日；〈編者的話〉，《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5日。

⁵¹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頁3。原文的表述是「他們說，共產主義不能表明時代的特徵」。

⁵² 分別刊於《現代青年》1927年1月12日、1月13日、2月23日、3月28日、4月5日各期。

提倡無產階級革命」。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既然缺乏種種條件，不能成工〔功〕，又且不合於中國民眾需要……這是主張勞工專政的 CP 同志也深深認識的。所以 CP 同志才加入我們黨裡來實現國民革命，本黨所領導的被壓迫階級共同努力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為今日中國最適合的最恰切的一種革命方式，誰也承認了的。」⁵³緊接該文的是名為〈告走錯了路的青年〉的短文，內稱共產主義是將來而不是現在所適用的主義，希望「走錯路」的青年，要認清環境趕緊回頭。⁵⁴與之對應的是，《現代青年》多次刊出一些公開宣佈退出中共的青年之文章。如曾在《廣州民國日報》廣告欄刊登〈退出共產黨啟事〉的孔聖裔和丁鴻誥，前者在該刊發文，自稱曾經左出到國民黨的主義與決議以外，不過是一個「失了時代性及不適應中國環境所需要，而只曉唱高調的革命青年」。在退出共產黨後，他決定為自己改別號「昨非」——即今是而昨非。丁氏則撰文道：「革命的第一個要素，就是時間性……斷沒有失卻了時間性的主義而可算是革命的。在手工業社會的封建制度底下，我們卻主張社會革命，那豈不是絕對的唯心論麼？不是失去了時間空間性的革命運動麼？」⁵⁵自創刊之日起到廣州清黨前，主張共產主義、列寧主義不合國情的觀點在《現代青年》到處可見。其實在該刊創辦前不到一個月，周恩來已就共產革命是否適合時代需要之問題在《人民週刊》作過回應：

一個時代的革命當然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和環境的要求。目前的民眾運動並無違反國民革命的方式……工農運動並未超過國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國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農的集會自由，工人罷工權，工農生

⁵³ 古有成，〈中國國民革命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古有成字梁成，廣東梅縣人，中山大學文科畢業。1926年至1927年初，先後在中央宣傳部、廣州市黨部任幹事、宣傳委員等，廣州「清黨」後任黃埔軍校第五期政治部中校宣傳科長。約1929年至30年代中從事過翻譯與小說創作。抗戰結束後在廣東省政府擔任秘書處主任秘書。古氏（有時用筆名「有成」、「成」）初時主要在市黨部所屬的刊物《廣州評論》、《廣州青年》撰文。目前沒史料表明古氏是否LY成員。

⁵⁴ 廂東，〈告走錯了路的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

⁵⁵ 孔聖裔，〈讀了〈大家覺悟過來罷〉的回音〉，《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25日；丁鴻誥，〈怎樣才是一個革命者〉，《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8日；孔、丁二人也在廣告中公開發表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無需「超時間性」的共產主義，見〈退出共產黨啟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16日，2版。

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動，外間流言說工人要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實行勞工專政，完全為反動派離間工農與政府之休戚關係。⁵⁶

周恩來這次發文，側面反映當時國民黨對大後方民眾運動之不滿，也是對領導這些運動的中共之不滿。1926 與 1927 年間，廣州市頻頻發生工人罷工、請願、械鬥事件，省內多地又常有農團與民團開戰之事。左派陳樹人、陳孚木執掌省農工廳時，對這些衝突均難以應付。國民黨方面希望抑制過多的民運，1926 年 12 月初中央黨部與政府北遷之際，譚延闓特意與周恩來單獨會面，又聯同其它廣州政要跟劉爾崧等十幾名工會首領談話，告誡廣州工人應團結，並有責任協助政府鞏固後方，⁵⁷可見國民黨方面對民運之疑慮。尤有甚者，當時廣州竟出現中共將鼓動工人推翻政府實行勞工專政的謠言，⁵⁸一定程度上顯示各方對中共及其民運之不安。中共中央也承認那時廣東工人的要求、行動已達到社會經濟所能容許的頂點，若繼續向前將變成奪取政權，但他們不支持演變成這種情況。可見上面周恩來的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表，目的是對廣東國民黨當局取善意態度，試圖「滅火」。⁵⁹不過從隨後出版的《現代青年》之態度可知，左派方面並不滿意，哪怕他們相信中共的表態，也要大力宣傳，提醒後者不得「超前革命」。⁶⁰關於當前革命道路的選擇，與青年們應加入哪個革命黨直接相關，甚至與「要不要國民黨」有關。

⁵⁶ 周恩來，《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廣州：人民週刊社，1926），頁10、頁12。此文原名〈國民革命及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刊於1926年12月的《人民週刊》。

⁵⁷ 《譚延闓日記》，1926年12月1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春秋TIS謄訊系統，最後訪問日期：2023年8月28日，網址：<https://mhdb.mh.sinica.edu.tw/diary/browse.php?book=dHlr&listNo=80C1F405-88AC-41A3-BD56-9F1658FB1A4E>；一起召見工會領袖者還有戴季陶、陳樹人、李濟琛、何香凝。見〈黨政府召集工界談話紀〉，《總匯新報》（新加坡），1926年12月27日，5版。

⁵⁸ “Document76,” in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eds.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07.

⁵⁹ 〈中央對於粵區政治報告的決議〉，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頁591-592。

⁶⁰ 同日李燏生作社論也表示，現在除國民革命外沒有其它最正確的路途。見燏生，〈歡迎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12月27日，2版。

五、關於國民黨階級性質的討論

1926年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公佈意在限制跨黨分子的整理黨務案後，蔣中正曾公開建議黃埔軍校內的跨黨分子退黨。隨後張太雷發表〈到底要不要國民黨〉一文，暗示中共可丟開國民黨，獨自承擔革命的責任。⁶¹《現代青年》創刊時，張太雷的文章已發表約半年，但刊中常有針對「要不要國民黨」的回應，可見左派對該文相當在意。具體有劉范的〈如何才能做一個國民黨的黨員〉，與王昌濬的〈總理逝世二周年紀念日敬告革命青年〉。⁶²李燧生因應《現代青年》「連日與共產黨作對」受到的指責，質問道：「你有見過共產黨的刊物嚮導誣衊本黨的言論麼？你有見到人民週刊〈要不要國民黨〉的文章麼？」⁶³

共產派之所以充滿自信，部分緣於他們相信自己代表充滿前途的無產階級，而國民黨則代表資產階級。周恩來曾在《人民週刊》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富於妥協性，小資產階級也常搖擺不定，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在中共的領導下能推動國民革命毫不妥協地前進。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的革命，不同的階級性反映到國民黨內形成各派，故國民黨不能成為純粹的左傾政黨，共產派在國民黨內能促進後者左傾。⁶⁴對於國民黨左派，中共視其為廣大小資產階級和「非階級的知識份子」的代表。鞏固共產黨與左派的同盟，就能夠將這部分人團結在革命的陣營當中。⁶⁵

左派意識形態雖深受中共影響，但不一定接受中共這種階級與革命相互對應的說辭。最早在《現代青年》表示不滿的還是古有成：

⁶¹ 張太雷，〈到底要不要國民黨〉，《人民週刊》，第14期（廣州，1926.06），頁6-8。《嚮導》、《人民周刊》等共產派喉舌，功能不僅限於對外宣傳，其文章會成為CP、CY各支部、小組會議指定閱讀并討論之材料，成為指揮黨、團員言之官方文件，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⁶² 分別見劉范，〈如何才能做一個國民黨的黨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4日；王昌濬，〈總理逝世二周年紀念日敬告革命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2日。

⁶³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2日。

⁶⁴ 周恩來，《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廣州：人民週刊社，1926），頁25-29。

⁶⁵ 李志毓，〈話語、路線與鬥爭中的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問題為中心〉，頁154。

現在有一二為英雄思想所支配的人，把馬克思的學說搬過中國來……說什麼國民革命進程中資產階級總是富於妥協性，小資產階級也常搖曳不定，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彷彿國民革命只是無產階級才配參與……某些人把自己劃入無產階級，隱然以最革命者自居，似乎在說「革命事業，唯有我們才能獨佔了！」他們把這種思想散佈到群眾中，造成一種恐怖空氣，他們一二小英雄，便利用之來為所欲為。現在國民革命，只要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人，就有資格參加，不能把他們列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便輕視他們的革命性。共產黨要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國民黨卻要領導全國被壓迫民眾——包含無產階級去幹國民革命。⁶⁶

在這裡，古有成願意把資產階級歸入革命隊伍，但還有不少左派甚至不希望把自己與資產階級(哪怕是小的)沾上關係。國民黨左派的階級性質，事關其未來的終極命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小資產階級作了悲劇性的預言，它們要麼為維持自身地位而走向反動與滅亡，要麼只能無產階級化。⁶⁷錫慶在其〈你不應該確信〉中呼籲：「國民黨的革命同志，你不應該確信，一般牽強附會來解釋我們革命的黨和主義的一切的話。同志，你不應該確信，本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顯然知道馬克思的「科學」預言，故主張國民黨不是某一階級的政黨，而是維護參加國民革命戰線各階級利益的黨。「自然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本黨亦在維護之列，但並不希望小資產階級永遠存在，而且要無產階級化」，將來還要消滅小資產階級。他引用甘乃光的觀點：國民黨是以農民為階級基礎。⁶⁸甘乃光早在1926年9月發表〈誰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一文，認為依照國民黨的立場與歷史，不能以資產階級為基層，因為我國的資產階級都與買辦軍閥官僚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還是農民階級，從此提出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是農民。但甘氏同時堅持國民革命是各被壓迫階級共同參與，且各階級

⁶⁶ 古有成，〈階級，民眾，和本黨〉，《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0日。

⁶⁷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54-55。

⁶⁸ 錫慶，〈你不應該確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3日。

利益若發生衝突，要以民族利益為前提。⁶⁹這裡就含有否定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味道。

從理論上說，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事關其生死。在「科學」預言中，小資產階級註定滅亡，甘乃光當然要幫國民黨脫下小資的帽子。儘管如此，在中共看來國民黨、甘乃光跟農民階級依舊沒什麼關係，其跨黨黨員仍不斷傳播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革命黨的觀點。1927年1月15日，有名為情生的中央政治軍事學校入伍生寫下他對校內共產派的不滿：

我以前很奇怪那些思想先進的同志們罵我們很忠實為小資產階級，原來本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有一次一位同志在小組會議上說北伐進展太快，是很危險的。他們對黨的攻擊無微不至。勞資仲裁會，禁止政府機關工人罷工的命令都是壓迫工人，廣東省黨部是包辦的選舉，廣州政治分會是什麼東西……都是大會上公然發表的言論。⁷⁰

左派是否小資產階級還關係到革命分子對入黨的選擇。有學者指出，國民黨一大之後發生大量國民黨青年加入共產黨或共青團的現象，他們往往是國民黨內革命積極性比較強的人，加入國民黨彷彿是他們加入共產黨的橋樑。⁷¹在革命狂飆的年代，思想和行為越是激進、徹底，彷彿就越代表著革命。共產分子給國民黨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也即將後者與「妥協性」、「搖擺不定」聯繫起來，後者在一些激進分子眼中甚至等於不革命。有左派青年驚覺，國民黨在跨黨分子口中已經不是革命黨了：

有一次開小組會議，由特別黨部擬定題目……其討論題目是：「本黨是什麼黨」。……(討論後)評判員就說：「本黨有左派右派，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不革命的，所以本黨不能算為革命黨。……本黨是聯合各階級的，所以因利害不同的時候，就妥協而偏於右，共產黨單是無

⁶⁹ 甘乃光，〈誰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收入朱亮基編，《農民淺說》(南京：中央書局，1927)，頁29-30、36-37、25。此文又稱《國民黨的階級基礎》。

⁷⁰ 情生，〈一個武裝革命青年的喊聲〉，《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9日。

⁷¹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87-88。

產階級的，利害是一致的，所以沒有左右派之分，能夠叫做革命黨，本黨就不能了。」⁷²

甚至連國民黨左派也被視為不夠革命。在 1926 年 12 月 6 日出版的《中國青年》中，卓愷澤(筆名斫石)把目前只想當左派，等國民革命完成後再入 CP 或 CY 的人斥為「懦弱」、「投機」，並叫這種「假革命青年，倘若不肯即早回頭，就老老實實滾到右派的旗下去攢營攢營」。⁷³一個月後，有名為團團的作者《現代青年》表示，很多朋友告訴他革命「就非加入 CP 或 CY 不可」，否則「你就好容易流為右派！」他感歎，如國民黨青年都加入中共，那國民黨還怎麼辦？⁷⁴另有左派青年指出，黨外不少人認不了國民黨是什麼黨，於是一般人不知不覺把共產黨看作左派，國民黨是右派，至少都是新右派。⁷⁵

六、對國民革命不徹底之說的不滿

國民黨的階級屬性與資產階級相關聯後，它就被貼上「不徹底」的標籤。按一些共產分子的理解，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不徹底的民族革命。國民革命僅是推翻舊政權，而共產主義革命則是顛覆一切舊秩序的社會革命，二者的徹底程度高下立見。因此，指導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不夠徹底，革命後還要爆發一次共產主義革命，革命才徹底完成。⁷⁶共產革命同時還是世界革命，將中國與世界連成一片，聽上去比國民革命高一個層次。正如某疑似共產派者所言，「現在是國民黨的時代，將來就是共產黨的時代了」，

⁷² 印心，〈國民黨是不是革命黨？〉，《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25日。文中黨部指黃埔軍校特別黨部，自共產黨員集體退出該校後，學生意識形態仍特別左傾。

⁷³ 斫石，〈這是不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理由嗎？〉，《中國青年》，第144期(上海，1926.12)，頁488。其實該文是批判臨到共產革命爆發才想投身革命的人，對目前的左派仍持正面態度，惟不通讀全文，則會給左派予極壞的印象。

⁷⁴ 團團，〈讀了〈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5日。

⁷⁵ 格孚，〈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⁷⁶ 親共的鄧演達也認為國民革命完成後，必來一個共產革命，到時就是國民黨壽終正寢之日。他們是為共產黨開路的清道夫。見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頁39。

國民黨的存在簡直是多事。⁷⁷因此，領導徹底革命，實現徹底主義的黨，更有加入價值，「不徹底」三字成為共產分子勸誘國民黨左派青年改投共產黨的殺手鐮之一。李燄生在 1928 年曾把這個親身經歷寫成短小說：

「松哥！你說革命，應該怎樣呢？」丞中向寒松問著。「現在革命不是已經開始了麼？」寒松很注意而故作自然的答他。「我以為我們革命一定要徹底，最徹底的革命，要算共產黨了，」他那略矮而面部略暗色一個姓劉的同伴插口的說，寒松微笑著。「我以為要革命，非加入共產黨不可！」一個面部瘦削而牙微露姓張的同伴說。「那麼！國民黨是不是革命的呢？」寒松反問著。……「是，革命的。」「那麼！我們革命就去革罷，國民黨既是革命的，我們又何苦多此一舉，要加入共產黨呢？」寒松很嚴正的說。「你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大徹底的，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工人也是不得什麼利益的，你看，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地權仍在，資本仍在的，怎樣能夠徹底呢？」一個同伴很緊張的說……⁷⁸

共產派的這些言行已直接動搖左派的基礎，左派對此進行反擊。甘乃光對國民黨右派問題曾發表講話，後同時載於《國民週刊》與《現代青年》，可見左派對之重視。甘氏認為每個黨都有左右派，「無論如何左右派仍然是革命黨中的革命份子，若果左到出乎那一個革命黨的主義與決議以外，就不能算是這個黨的左派，若果右到太過落後，右到不革命的途徑，亦不算是這個黨中的右派」。因為右派也是國民黨員，他們是「有革命的熱誠而不明瞭革命的理論者」，將來終究會向左轉。至於右到反革命的人，則會被開除出黨，故不能算國民黨員。這番話實質想將國民黨與右派切割，表明國民黨只有左派，是革命的黨。哪怕是某些被指為「右派」之黨員，只要還沒右到「不革命」的程度，甘乃光等人亦可與之聯合。前述驚覺本黨被共產派叫做「不是革命黨」的青年，亦急忙引用甘乃光這段說辭為國民黨辯護。⁷⁹

⁷⁷ 團圓，〈讀了〈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5日。

⁷⁸ 李燄生，〈迷途〉，《良友》，第24期（上海，1928.02），頁16。

⁷⁹ 甘乃光，〈我們現在對於一般革命份子的態度〉，《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1日；印心，〈國民黨是不是革命黨？〉，《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25日；同意甘氏論調的還有沙白，〈呼喊的回聲〉，《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日。

針對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是否不徹底的問題，左派不斷在《現代青年》指責共產分子曲解三民主義，侮辱孫總理。左派的基本論據來自孫中山解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的言論，認為二者有一樣的革命目標。例如署名健行者針對卓愷澤在《中國青年》的文章，斥「有人說國民黨的工作，只是共產黨的過渡的橋樑」是荒謬絕倫；斥「有人說國民黨的工作，不能像共產黨那般徹底的，不能解放無產階級的」是荒謬無稽。健行引用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指出二者「原不是不同的事，不過其所用的手段不同罷了」，國民黨實行孫文主義，最終也要消滅階級。他對卓文一段一段地反駁，指出想等國民革命結束再加入 CP、CY 的人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完成國民革命後也絕不會「卸責」，把社會革命留給共產黨。他在文末強調，國民黨絕不是僅以國民革命為最後目的。⁸⁰該刊同期另一篇文章寫道：「國民革命成功之日，整個的孫文主義實現之時，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大同主義開始的一天，也就是社會革命，世界革命在中國告竣的一天。又何必懷疑孫文主義之不徹底呢？更何必污蔑國民黨的政綱不完善呢？」該文批評意志不堅定的黨員，聽見其他團體分子（暗指 CP、CY）自稱組織嚴密、分子純粹、團體堅固，便懷疑國民黨。⁸¹說到底，左派是要向激進青年證明，國民黨的主義足夠先進。類似的文章仍有不少。⁸²

七、對於國共關係的思考

前三個在《現代青年》討論的問題，實質都能牽涉到國共兩黨之關係，故左派作者將此關係作為對象擺出來重新思考，是非常現實並符合邏輯之結果。該刊剛出版不久，就有多篇文章質疑跨黨現象之合理性。例如古有成譴責那些覺得加入共產黨是「無所謂」的國民黨人，是國民黨不需要的。他要

⁸⁰ 健行，〈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9日。

⁸¹ 陳鼎，〈革命青年思想的矛盾〉，《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9日。

⁸² 如李鑑周，〈國情和實施主義的問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0日；黃健生，〈你不要懷疑〉，《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8日；翁景熹，〈看完了〈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以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3日等。

求所有黨員必須對黨忠誠，如果有人認為孫文主義、國民革命最適合中國，就做個努力奮鬥的國民黨員；如果認為共產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才是最合適救中國、救世界的，便馬上脫黨，加入共產黨去。⁸³甘乃光在其〈我們現在對於一般革命份子的態度〉分析了跨黨分子帶來的問題：跨黨的共產黨員，在遇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決議發生衝突時，只能服從其中一個黨而背棄另一個黨。但由於共產黨強固組織的作用，跨黨者都選擇執行共產黨的決議。甘氏認為國民黨需要容納或聯絡黨內外的共產分子，但純粹的國民黨員要加強自身團結，否則會變成受共產分子容納。⁸⁴李燄生用同情與勸說的口吻說：「跨黨的國民黨青年們！朋友！你們的思想太矛盾了。……假使兩黨主張有時不對，你們何去何從呢？」一旦選擇遵行共產黨的決議，「你們置國民黨於何地呢？國民黨固然散漫不理及你們，但你們心上過得去麼？……如果你嫌國民黨的主義淺薄，盡可入共產黨，如果仍然是信仰國民黨主義，盡可堅心入國民黨，須知人生發生矛盾，是人生一件不幸的事。」⁸⁵

另外，古有成借回應《嚮導》第180期內容的機會，早於1927年1月6日的《現代青年》撰文，冀望以整理黨務案去規範兩黨關係：「現在竟然有本黨黨員邢適生(因邢適生信中有本黨字樣，我們可姑認他為本黨黨員)對之〔按：指整理黨務案〕表示懷疑，懷疑不已，且叩之於我們的朋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這是本黨內什麼樣的一種怪現象！……這不是一種違背紀律的行動是什麼？」⁸⁶古有成認為整理黨務案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容不得有國民黨員懷疑。他一方面贊《嚮導》向邢氏的回復「大體尚算不錯」，一方面又指《嚮導》157期〈最近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之意義〉含「幼稚的說話」(指責整理黨務案部分實現西山會議的精神)。古氏認為，黨內還有像邢君一般頭腦不太清醒的人，故還有必要宣傳整理黨務案。隨後該文大段轉錄整理黨務

⁸³ 古有成，〈正告少數「無所謂」的黨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4日。

⁸⁴ 甘乃光，〈我們現在對於一般革命份子的態度〉，《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1日。

⁸⁵ 麗婉女士〔按：此為李燄生的化名〕，〈告國民黨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8日。

⁸⁶ 《嚮導》(上海)第180期(1926年12月5日)的《讀者之聲》，刊有署名邢適生者向陳獨秀寫的信，提問國民黨為什麼要通過整理黨務案，希望《嚮導》對該案表示態度。《嚮導》僅簡單回復請參閱其157期內容，自稱中共無權過問國民黨內部問題。

案及相關訓令，並夾入議論和解釋。文章最後，古氏表示「整理黨務案，未能完全實現……實是我們所痛心」，又指近來《少年先鋒》、《中國青年》發表的「幼稚說話」，廣東省黨部選舉第二屆執監委員發生紛爭，以及工人慶祝元旦時發出「無意識的口號」，都令人感覺到整理黨務案尚未完全實行。⁸⁷

對於古有成的主張，《嚮導》在1月份的第185期刊出陳獨秀(筆名「實」)之短文〈國民黨的敵人是誰？〉。文中暗指古氏目共產黨為敵，又嘲諷他是「穩健」分子。在《嚮導》的話語中，「穩健」二字若加在國民黨人頭上，往往將後者與反動聯繫起來。⁸⁸《嚮導》自1926年12月5日第180期開始，使用「穩健」次數劇增，其內容多指國民黨中「穩健」人物與帝國主義者、軍閥或封建勢力接觸，商議妥協辦法，壓制群眾運動，甚至驅逐共產派等。在1927年4月以前，《嚮導》還頻頻摘錄境內外新聞關於國民黨方面「妥協」的報導，且時附諷刺性評語。中共口中「穩健」、「妥協」的矛頭日益明顯地指向與中共關係惡化的蔣中正。⁸⁹到3月中甚至出版完全為反蔣專號的《嚮導》192期。

古有成一開始對陳獨秀的嘲諷沒反應，左派對國共關係的討論一度減少。隨著政局的變化，左派在3月重拾該話題，其文章之言辭轉趨激烈。古有成刊發一篇〈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稱國民黨是公開的黨(暗諷跨黨者不願公開自己)，其公開訓練黨員，其宣傳整理黨務案，是為促使黨員遵守紀律、擁護該案。他尤其批評《嚮導》「把穩健二字來攻擊我們，這穩健二字直比反革命三字還要陰險狠毒」，是帝國主義式的分化策略。他最後質問中共是否把國民黨視作敵人。⁹⁰整理黨務案的發起人乃蔣中正，蔣在2月末曾

⁸⁷ 古有成，〈本黨整理黨務決議案〉，《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6日。中共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第二屆委員選舉中完全失利，驚覺被左派「出賣」，故發生紛爭與親共分子叫口號之事。

⁸⁸ 參見和森，〈國人應當共棄的陳炯明〉，《嚮導》，第8期(上海，1922.11)，頁62；獨秀，〈悼孫中山先生〉，《嚮導》，第106期(上海，1925.03)，頁881；獨秀，〈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上海，1927.01)，頁1945。

⁸⁹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頁28。

⁹⁰ 古有成，〈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7日。

公開表示會「制裁」共產黨，暴露了他與武漢及共產派方面的矛盾。古氏此時突然發文回應陳獨秀，很難說沒有擁蔣之意味。

隨後左派在《現代青年》對迎汪復職與提高黨權運動大唱反調。在大聲表達其擁蔣態度之同時，對反蔣之共產派作嚴厲批評。周應湘表示要「揭破野心之徒於促汪銷假運動中的狠毒的企圖……他們為欲實現破壞北伐，分裂本黨領袖汪蔣之結合，操縱本黨的狠毒企圖……一切反動分子和野心之徒，受不過蔣同志的監督，特發為攻擊之論，以攻擊蔣同志；更借迎汪之舉，以為推倒蔣同志之武器了」。他呼籲掃除迎汪運動的障礙物與野心之徒(暗指共產派)。⁹¹古有成評論提高黨權時則說：「世界上無論任何政黨，自黨的黨權，必不容他黨越俎代庖。及其奪取了政權以後，必然極力把持著這種政權，去力謀自黨的政策和主義的實現，……一切大權，是絕對不容他黨參與的。」⁹²意思是哪怕國民黨真的「恢復黨權」，其黨權與政權均不容共產分子插手，完全否定武漢國民黨中央二屆三中全會後吸收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工作之決定。古氏之觀點與後來吳稚暉在上海責難汪精衛之話語可謂異曲同工。⁹³

與之相配合的是，《現代青年》於3月下旬連續刊文指控共產派之語言暴力，為左派青年「大吐苦水」，提出必須「糾正」共產分子的「幼稚」言行。有叫格孚的人抱怨：

(嚮導等刊物)對於我們國民黨的領袖時常攻擊，污蔑；對於我們國民黨的主義，非有意曲解懷疑，便譏諷，詆毀。……使我們已經感受十二分痛苦了！……如果有人說聲不是，他們便把反動派，反革命派，右派，國家主義派……等等名詞加在你的頭上。……他們真是思想界的慕沙裡尼了！我們受不過他的壓迫了！……我們在合作的原則上，固然要反對右派，同時對於幼稚的CY，違背兩黨合作的原則的，我們

⁹¹ 周應湘，〈促汪銷假運動中我們應有的認識〉，《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6日。

⁹² 有成，〈黨權與政權〉，《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3日。

⁹³ 吳氏認為汪與陳獨秀所作之共同宣言，是公開承認國民黨願同共產黨共治中國之表示。

也不能不善意糾正錯誤，然而因此惹起了CY和CP的反感，給我們一個「新右派」的頭銜，真是陰險惡毒呵！⁹⁴

李燧生也親自控訴道：

……共產黨幼稚分子，反對及詆毀本黨主義，和孫總理的人格，我們是國民黨員，不能便默爾默，在現在〔代〕青年發點不平之鳴，以懲戒幼稚分子，以圖兩黨合作的原則有所保障……糾正、訓練、指導，本黨黨員，是十二分重要的……但一訓練起來，人又說我們結黨營私，新右派的頭銜又印在我們名片上了。⁹⁵

還有署名逸者的作者抱怨，國民黨員有時批評共產黨的「幼稚分子」，即被誣為反共或右派。現在整理黨務案「雖然不像具文，但實行了的很少」。國民黨員因勸告、或批評「共產黨幼稚分子(右派)的幼稚病」卻受到攻擊，體現了整理黨務案沒有實行。共產黨的「幼稚分子」可以對國民黨作攻擊，國民黨卻不許同樣地批評共產黨，「本黨容納共產黨政策，彷彿像變為共產黨容納國民黨政策了！」⁹⁶

此時左派(至少是部分)處於一種自相矛盾之狀態。儘管他們在文章裏大吐苦水，總不忘把絕不反共，或謹守所謂總理手定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話掛在文末。即便古有成疾呼跨黨者馬上脫黨，仍聲明「我這篇文章，完全是對本黨少數糊塗黨員而發的，和共產黨絕無關係」，「聯俄聯共是本黨聯合戰線的政策」，只要合作條件不被打破，「本黨必然不肯打破這個聯合戰線的。」⁹⁷李燧生回答讀者提問《現代青年》是否違反「三大政策」時，稱其「不敢與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的政策違背」。⁹⁸

⁹⁴ 格孚，〈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⁹⁵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2日。

⁹⁶ 逸雲，〈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以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1日。

⁹⁷ 古有成，〈正告少數「無所謂」的黨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4日。

⁹⁸ 〈問答〉，《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日。

儘管左派有不反共之承諾，廣東中共面對山雨欲來之緊張局面，還是在3月底做出退讓表示。⁹⁹《少年先鋒》因應很多讀者「要求我們對於外面誹謗我們的言論加以答覆」，在1927年3月21日的刊物上做出非常克制的回應。¹⁰⁰該刊下一期又登出〈一封給國民黨左派青年同志書〉，把孫中山稱為與列寧並列的導師，把CY與左派的衝突解釋為敵人之造謠中傷，絕對否認有詆毀孫中山、三民主義與國民黨。該文還說，有很多激進青年被誤認為CY，如果左派發現有發出詆毀言論的CY，可拿出證據給本團組織，以便懲罰。¹⁰¹

左派獲此信後，並未減弱其攻擊共產派之火力。4月之後，《現代青年》刊出更多攻擊性文章，有的批評CY的回信文過飾非；有的登載寓言，嘲諷共產黨是喧賓奪主的養子，掛羊頭賣狗肉；有人憶述防城共產派排擠左派，叫喊打倒LY的情況。¹⁰²之前一直表示謹守「三大政策」的左派，此時更開始對該政策提出疑惑。有人留意到三大政策與孫文主義不是一回事，指責只要前者而不要後者的人，若非糊塗蟲便是陰謀家。又有人指出，最近人們常

⁹⁹ 隨著北伐進展，在粵共產派很多幹部離粵北上，導致其勢力減弱，故留守廣東的黨首在多方面都採取相對務實、靈活的態度。如領導工人反對廣州店主年初二解雇工人的抗爭（「無情雞」事件），因廣東當局態度傾向雇主，中共選擇妥協。見霍新賓，《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係變動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頁225-259。不過上海中共中央面對廣州左派的攻擊，仍持向「資產階級」反攻的態度，陳獨秀繼續在《嚮導》攻擊「穩健派原來如此」。反應上海方面受共產國際代表影響，立場有時比廣州方面更左的現象。見“Document 76,” in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808；實（陳獨秀筆名），〈寸鐵〉，《嚮導》，第193期（上海，1927.04），頁2092。1927年春間廣州國共雙方均感到情形日益嚴重，且對兩黨關係之巨變有一定預感。見尸一（時任《國民新聞》副刊編輯，本名梁式），〈可記的舊事〉，收入中山大學中文系編，《魯迅在廣州資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頁268。

¹⁰⁰ 該文章呼籲革命分子要團結，不打筆墨官司，聲稱CY從來沒有詆毀孫總理、國民黨、三民主義等。見一聲，〈向幾位讀者解釋一下〉，收入廣東省檔案館等編，《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8）第4輯，頁494-495。

¹⁰¹ 〈一封給國民黨左派青年同志書〉，收入廣東省檔案館等編，《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4輯，頁508-509。這封公開信又刊於《人民週刊》第48期，並由國民黨的中華通訊社發表在3月31日的《廣州民國日報》。該信是畢磊、王克歐親自與李鏡生談判後同意撰寫，見李鏡生，〈革命老人何香凝〉，《大人》，第41期（香港，1973.09），頁3。

¹⁰² 慕仙，〈我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意見〉，《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5日；鋼強，〈寓言〉，《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2日；蒲螫龍，〈防城青年狀況〉，《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2日。

說中山的政策，而不說中山的主義，但要知道政策是隨時可以「流動變更」的。¹⁰³李燮生聲稱，很多人來函質問並請解釋，國民黨究竟是容共還是聯共。他認為按國民黨的訓令，到目前為止應該是容共。但國民黨組織散漫，毫無紀律，無人指揮，事實上容不了共。至於「聯共」二字，其意義非常含混。「聯」字是兩個對等團體，因一定條件使其有聯合之可能，二者訂立彼此互相遵守的信約，才可謂之「聯」。政策是適用於特定時期與環境的，如果失了時效和環境的需要，便沒有存在之必要，因此容共政策要變成聯共政策。將來兩黨應該各自允許對方參與己方黨務，否則應把黨籍問題劃分清楚，使指揮訓練各得宜。在廣州「清黨」前一日，他還在社論上期待汪精衛主張的國民黨南京會議，能夠「重新估定合作良法」，「泯滅一切糾紛」。¹⁰⁴問題是在「三大政策」受到動搖，以及左派洶湧而至的惡意中，兩黨如何能和平地調整其關係？

八、結語

1926年下半年，廣州國民黨左派逐漸積聚力量，嘗試打造自己獨立的綱領、組織與宣傳工作，並逐漸向中共發起挑戰，他們一方面在國民黨省市黨部排斥中共勢力，¹⁰⁵另一方面在自己的機關出版物持續對中共作出批評。左派的批評既涉及現實問題，如對倒蔣運動等的不滿，又涉及國共關係，帶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基本問題。後面的問題相當重要且敏感，包括中國革命應走什麼道路，兩黨誰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國民黨究竟代表哪個階級，是否屬於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革命是否徹底；如何調整國共兩黨的關係。左派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無論現在抑或將來都必須並只能實行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

¹⁰³ 格孚，〈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植農工〉，《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8日；慕仙，〈我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意見〉，《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5日；認為主義不能變，政策可以變的，還有蘊真，〈主義與政策〉，《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¹⁰⁴ 李燮生，〈「容共政策」與「聯共政策」〉，《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9日；燮生，〈南京會議的使命〉，《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4月14日，2版。

¹⁰⁵ 1927年1月廣東省黨部選舉第二屆執監委員，15的名執行委員中，包括何香凝、甘乃光、陳孚木等大約9名左派，共產黨員僅剩2名。

命；國民黨絕非純為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國民革命之徹底性不亞於共產革命；在兩黨關係方面，他們聲討共產派對國民黨的所謂污蔑與造謠，要求糾正所謂幼稚分子，甚至提出跨黨分子退出共產黨或共青團。

上述左派的主張，與其不停標榜服從「三大政策」之承諾互相矛盾。其實對眾多國民黨要人而言，無論其屬於黨內哪個派別，在涉及國共關係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其主張都相當接近。¹⁰⁶1925年，戴季陶在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即對跨黨行為提出異議，主張在當時的中國，「三民主義的必要，和國民革命的必要，這是空間和時間的真實性」，CP、CY則是時代不需要的；希望CP、CY停止在國民黨內吸收自己的新成員，也不得「對中國國民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以及批評共產黨機關報對國民黨的領袖「故意造謠」，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任國民黨的心理等等。¹⁰⁷1926年戴季陶被聘為中山大學校長，他來穗就職後，《現代青年》多次登載他的演說，可見戴氏受廣州左派之歡迎。在西山會議派方面，他們明確指出國民黨內不容存在兩個主義，實質表示其不認可共產革命之必要性，而以國民革命為唯一依歸。其對黨團問題之深惡痛絕，指向的是黨內有兩個指揮中心與共產分子的忠誠問題（這也是《現代青年》關心過的問題）。在二二〇事件後不久，蔣中正提出「整理」內部的意見，內含不得「誣蔑」總理人格，「抹殺」總理歷史，「批評與懷疑」三民主義等要求。整理黨務案頒佈後，蔣多次發表演說闡述其對兩黨關係之主張。蔣認為黨內不能有兩個主義，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三民主義乃當下中國革命的需要，他們要實行三民主義而非共產主義。蔣甚至建議共產黨人暫時放棄信仰共產主義，只信仰三民主義，做三民

¹⁰⁶ 李玉貞先生認為，從西山會議派之出現到武漢左派七一五分共為止，無論國民黨右派或左派，其在原則問題上都沒有實質區別。惜李先生對這個觀點未作系統論證。見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371。

¹⁰⁷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廣州：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1927），頁56、58、62。該版有一篇《翻印的話》，即1927年6月古有成所寫。參加過中共三大，後作為塔斯社記者在穗協助鮑羅廷工作的沃林（別林尼基）認為左派思想很接近戴季陶。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卷7，頁70。

主義的工作，做純粹的國民黨員。¹⁰⁸蔣氏的思想被蘇聯人認為是來自戴季陶，並稱他為「武裝的戴季陶」。¹⁰⁹蔣氏之演說以及整理黨務案中的部分條文，與後來左派在《現代青年》的主張多有吻合。¹¹⁰長期被共產派視為國民黨內代表買辦勢力的伍朝樞，也公開撰文表達與蔣近似的看法。¹¹¹其實哪怕 1927 年武漢方面的部分左派領袖，他們對國共關係中的敏感問題也有類似關注。據 4 月 5 日發佈之《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陳獨秀在汪精衛要求下，表示國民黨與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否認中共將實行「無產階級獨裁」與「打倒國民黨」事，承諾中國只需要「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¹¹²此宣言從另一面反映代表自認左派領袖之汪精衛所關切的問題，即確保國民黨、國民革命、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之中心地位。後來湘鄂贛三地發生農工運動「過火」現象，加上蘇聯駐京大使館內秘密文件被曝光，難免令武漢左派懷疑中共有無全面實行俄式暴動(超前革命)之計劃。之後汪氏開始提出是否需要兩個革命黨並存，究竟誰領導誰的疑問，¹¹³武漢左派逐步走向分共。

正因為國民黨各派在思想上有這些一致之處，他們就有了團結反共的可能。他們應對中共的手段與態度在激烈程度上不盡相同，但都在嘗試抑制中共活動以保護國民黨，故廣州左派與李濟琛合作控制廣州市、廣東省兩黨部並排擠共產派就毫不奇怪了。在共產黨人眼中，左派自 1926 年底以來的種種行動在理論上是西山會議式的，是「團結從右翼到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一切

¹⁰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555、574、593；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162-163。

¹⁰⁹ 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5。

¹¹⁰ 如整理黨務案第一決議案，要求糾正妨礙兩黨合作之言論與行動，保障國民黨黨綱、黨章之統一與權威。第二決議案要求共產黨員不得懷疑及批評總理與三民主義，國民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共產黨。

¹¹¹ 伍氏此時已被蔣逼往上海，他主張國民黨內的共產派應暫行擱置共產主義理想，承認三民主義才是中國所需，專心做國民黨的工作。見C.C.Wu, "What Is the Kuominta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 25 September 1926, 91.

¹¹² 〈附錄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清黨運動》(出版信息不明，1928)，頁36-37。

¹¹³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235。

力量」反共。¹¹⁴左派日漸積累、表露其負面情緒，不代表其必然走向「清黨」，但他們顯然意識到兩黨關係之現狀必須有所改變。維持左派與共產派關係現狀的唯一紐帶是「總理手訂的三大政策」，前者在聯共的同時意圖「糾正」共產派言行以維繫兩黨關係。¹¹⁵一旦「三大政策」的合法、合理性被破解，兩黨關係將發生巨變。只是左派尚在討論如何改變政策時，清黨卻突然降臨。暴力清黨之發生與掌權者對時局的認識有關。那時上海、廣州不時流出共產派暴動之傳言，4月初李濟琛、甘乃光至上海與蔣密議清黨，對赤色工人謀攻外國租界之緊張氣氛當有體會。隨後廣州「清黨」，理由之一亦系共產派擬在16日暴動並進攻沙面。¹¹⁶廣州「清黨」後，曾標榜絕不反共的廣州左派也熱烈歡呼，積極加入「清黨」行列(有部分人如陳樹人、黃鳴一等反對清黨、擁護武漢而被排擠)。¹¹⁷李焱生雖因右派迫害而逃亡外地，仍興奮地向《現代青年》投稿，表達其對共產派之怨恨被徹底釋放後的喜悅：「我們在既往的歷史，曾努力向言論威權思想獨裁的中國共產黨進攻，不可一世逢戰必勝的CY，也要致書投降」。¹¹⁸可見之前李氏不反共的聲明乃言不由衷，左派與共產派之決裂只是時間問題。

有政治學者研究西歐各國重要政黨的發展史後，發現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關係長期不睦，雙方哪怕和解也是短暫的。其結論是意識形態

¹¹⁴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關於廣東情況的報告〉，頁3。

¹¹⁵ 然共產派不可能接受，尤其像要求他們暫時放棄其共產革命理想，完全聽命於國民黨等要求，無異於讓CP、CY停止活動。

¹¹⁶ 〈左派反動醞釀之經過〉，《叻報》(新加坡)，1927年4月23日，頁18；鄧文儀認為莫斯科指揮中共實行全國總暴動，故派遣含鄧氏在內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加外國顧問約百人赴華指導中國大革命。鄧自稱一回穗即與甘乃光、李濟琛等報告，並探得廣州共產派將在4月16日暴動。見鄧文儀，《從軍報國記》(臺北：正中書局，1979)，頁100、103、106。據當前已知史料，儘管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通過激進的中國革命綱領，但國際並無全國暴動計劃，在粵共產派亦未準備暴動。但國際的這個綱領是否在國民黨內遭到誤傳，抑或後者有意以此藉口清黨，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¹¹⁷ 〈化腐朽為神奇之陳孚木〉，《小廣州人雜誌》，第85期(廣州，1949.07)，頁10。甘乃光仍是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委員。廣州還成立臨時接管廣東最高黨政軍大權的廣東省特別委員會，陳孚木是五委員之一。其所轄之宣傳、民衆運動委員會也有左派加入。左派的湯澄波接替黃鳴一做省黨部宣傳部長。

¹¹⁸ 李焱生，〈我們的誓師詞〉，《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6月9日。

相似的兩個政黨會爭奪對方的社會基礎與黨員，互相把對方視作競爭者，故其結盟最不穩定。¹¹⁹國民黨改組後，意識形態與共產黨有頗多相似之處，其群眾基礎又有大量重疊之處。隨著廣州左派開始重視爭取民眾，以知識青年為主要吸納對象，其與共產黨的競爭必然加劇。¹²⁰回顧國民黨容共期間的兩黨關係，可發現雙方在京滬穗三地學校均有劇烈衝突(含右派與共產黨的衝突)。《現代青年》對共產派刊物發起的輿論戰，反映兩個左翼政治勢力在爭取知識青年時的摩擦。雙方在爭奪中交惡，合作被迫結束，該歷史也相當符合歐洲國家左翼政黨聯盟破裂的經驗。

儘管廣州左派積極參加「清黨」，但他們仍標榜反對右傾，維護工農利益。¹²¹因此左派只是與右派合作反共，而非與右派合流。當反共告一段落，兩派之合作便迅速破裂。右派頻繁羅織罪名，指控各左派要人「包庇」共產黨、附從武漢政府、離間本黨同志等等。6月之後，甘乃光、陳孚木、徐天深(時為省黨部執行委員)、湯澄波等左派陸續逃離廣州。¹²²左派要人及支持者除在張黃事變期間短暫回穗外，¹²³要等到1928年成立國民黨改組派後，才能再度集聚力量的，並真正擁有成體系的左派理論與較完整的組織。不少參與擁護的黨員，就是曾經聚集在甘乃光周圍的左派青年。¹²⁴諷刺的是，那時的左派已完全把自己視作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

¹¹⁹ (意)帕尼比昂科著，周建勇譯，《政黨：組織與權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246。

¹²⁰ 如果國民黨是如其標榜的全民性政黨，它必然會跟中共爭奪無產階級。不過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可知，國民黨容共時期兩黨都吸納了大批知識份子黨員。

¹²¹ 〈農工廳召集各工會代表會〉，《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7年5月4日，頁2、張2；徐天深，〈清黨運動與擁護農工利益〉，《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4月29日，5版。

¹²² 梁尚賢，《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908-914。

¹²³ 1927年11月17日，張發奎、黃琪翔為擁護汪精衛，在廣州發動政變並組織左派為主的黨政軍機關。

¹²⁴ 如李撲生、陳克文、湯澄波、范譔、周應湘等，有的人抗戰期間還加入汪偽政權。李燾生在汪蔣合作後脫離汪派。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史料匯編、回憶錄、年譜

《清黨運動》，出版信息不明，1928。

Wilbur C. Martin. and How Julie Lien-ying eds.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中山大學中文系編，《魯迅在廣州資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 2，廣州：廣東省供銷學校印刷廠，1982。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 6，廣州：廣東省供銷學校印刷廠，198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卷 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 10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20，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許金生主編，《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 1909-1941》，北京：線裝書局，2014。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

- 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該書編輯組編，《彭湃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 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8。
- 鄧文儀，《從軍報國記》，臺北：正中書局，1979。

(二)報紙刊物

- 鳴鑾，〈發刊的話〉，《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
- 古有成，〈中國國民革命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
- 廂東，〈告走錯了路的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7日。
- 健行，〈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9日。
- 陳鼎，〈革命青年思想的矛盾〉，《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29日。
- 李敏生，〈熱情的應酬〉，《現代青年》(廣州)，1926年12月31日。
- 劉范，〈何才能做一個國民黨的黨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4日。
- 古有成，〈正告少數「無所謂」的黨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4日。
- 團團，〈讀了〈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5日。
- 古有成，〈本黨整理黨務決議案〉，《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6日。
- 古有成，〈階級，民眾，和本黨〉，《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0日。
- 甘乃光，〈我們現在對於一般革命份子的態度〉，《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1日。
- 錫慶，〈你不應該確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3日。
- 麗婉女士，〈告國民黨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18日。
- 孔聖裔，〈讀了〈大家覺悟過來罷〉的回音〉，《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1月25日。
- 李敏生，〈同情的失掉〉，《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8日。
- 邱祥霞，〈受傷的小鳥(四)〉，《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8日。

- K. N.，〈我一年來的回顧〉，《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0日。
- K. N.，《我一年來的回顧(三)》，《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5日。
- 丁鴻誥，〈怎樣才是一個革命者〉，《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8日。
- 月白，〈一封家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9日。
- 情生，〈一個武裝革命青年的喊聲〉，《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19日。
- 印心，〈國民黨是不是革命黨？〉，《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2月25日。
- 沙白，〈呼喊的回聲〉，《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日。
- 〈問答〉，《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日。
- 翁景熹，〈看完了〈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以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3日。
- 古有成，〈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7日。
- 李鑑周，〈國情和實施主義的問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0日。
- 王昌濬，〈總理逝世二周年紀念日敬告革命青年〉，《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2日。
- 周應湘，〈促汪銷假運動中我們應有的認識〉，《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16日。
- 逸雲，〈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誰〉以後〉，《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1日。
-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2日。
- 有成，〈黨權與政權〉，《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3日。
- 〈編者的話〉，《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5日。
- 〈通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6日。
- 黃健生，〈你不要懷疑〉，《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3月28日。
- 鋼強，〈寓言〉，《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2日。
- 蒲螯龍：〈防城青年狀況〉，《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2日。
- 格孚，〈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 蘊真，〈主義與政策〉，《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4日。
- 慕仙，〈我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意見〉，《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5日。

格孚，〈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植農工〉，《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8日。

箴生，〈總答覆〉，《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9日。

李箴生，〈「容共政策」與「聯共政策」〉，《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9日。

周應湘，〈覆CY的一封信〉，《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4月14日。

李箴生，〈我們的誓師詞〉，《現代青年》(廣州)，1927年6月9日。

箴生，〈歡迎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12月27日，2版。

〈退出共產黨啟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16日，2版。

箴生，〈南京會議的使命〉，《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4月14日，2版。

徐天深，〈清黨運動與擁護農工利益〉，《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4月29日，5版。

〈農工廳召集各工會代表會〉，《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7年5月4日，頁2。

〈省政府改組與古湘芹塌台〉，《總匯新報》(新加坡)，1926年10月8日，5版。

〈黨政府召集工界談話紀〉，《總匯新報》(新加坡)，1926年12月27日，5版。

〈左派反動醞釀之經過〉，《叻報》(新加坡)，1927年4月23日，頁18。

Wu, C. C. "What Is the Kuominta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 25 September 1926, 91.

〈化腐朽為神奇之陳孚木〉，《小廣州人雜誌》，第85期(廣州，1949.07)，頁8、10。

實，〈寸鐵〉，《嚮導》，第193期(上海，1927.04)，頁2092。

李箴生，〈何香凝老人軼事〉，《大人》，第41期(香港，1973.09)，頁2-9。

李箴生，〈迷途〉，《良友》，第24期(上海，1928.02)，頁16、26-27。

和森，〈國人應當共棄的陳炯明〉，《嚮導》，第8期(上海，1922.11)，頁62。

砍石，〈這是不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理由嗎？〉，《中國青年》，第144期(上海，1926.12)，頁486-488。

張太雷，〈到底要不要國民黨〉，《人民週刊》，第 14 期(廣州，1926.06)，頁 6-8。

獨秀，〈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 184 期(上海，1927.01)，頁 1944-1946。

獨秀，〈悼孫中山先生〉，《嚮導》，第 106 期(上海，1925.03)，頁 881。

(三) 專著

山田辰雄，《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

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第 7 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甘乃光，《中國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廣州：國民新聞報社，192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周恩來，《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廣州：人民週刊社，1926。

(意)帕尼比昂科著，《政黨：組織與權力》，周建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朱光編，《崇敬與思念》，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

梁尚賢，《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廣州：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1927。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曾慶榴，《廣州國民政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霍新賓，《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係變動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

朱亮基編，《農民淺說》，南京：中央書局，1927。

(四)論文

李志毓，《話語、路線與鬥爭中的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集團和小資產階級問題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9。

(五)網路資源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春秋 TIS 語訊系統，最後訪問日期：2023 年 8 月 28 日，<https://mhdb.mh.sinica.edu.tw/diary/browse.php?book=dHlr&listNo=80C1F405-88AC-41A3-BD56-9F1658FB1A4E>

《報壇「霹靂火」李燄生》，最後訪問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http://lowaiming88.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html>.

**The Anti-Communist Turn of the Kuomintang Left in
Guangzhou before the “April 15 Party Purge”: A Study
Focusing on *Modern Youth Magazine***

Peng Yico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Kuomintang's (KMT) allian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leftist faction of the KMT split from the Party by adhering to the policy of allying with Russia and accommodating the CCP. The KMT leftist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CCP to bring the revolution to a climax. In the process, the KMT left gradually developed a defensive and competitive mindset towards the CCP.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KMT leftists and the CCP in Guangzhou came earlier than it did in Wuhan. In late 1926, *Modern Youth*, a supplement published by the *Guangzhou Republican Daily*,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entral organs of leftist discourse and was welcomed by the leftist youth in Guangzhou. *Modern Youth* engaged in debate with *Guide Weekly*, *People's Weekly* and *Young Pioneer*, and it also published some leftist youths' criticisms of the Communists. The commentary published in *Modern Youth* in the months before the April 15th coup reflected the KMT left's thinking on their own revolutionary path and beliefs, their class affiliation, their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CP, pointing to the questions of who would lea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ho would ultimately prevail. The KMT left in Guangzhou's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with the Party's right wing

foreshadowed that it would eventually head down the path of joining with the rightists to oppose the Communists.

Keywords: KMT Left Wing; KMT-CCP Relations; Leftist Yout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